

# 五十一年风雨路<sup>①</sup>

## —— 狱中自述

我的乳名叫严五美，参加革命后叫严佑民，在华东工作时名岳炎。1918年生于陕西澄城县寺前镇。从我记事起，我的家已是走向瓦解的富农，人口十八，土地八十亩，牲口一，有全套农具和大车，雇工一。生活靠农业收入不够，还要靠外边做事的人寄钱回来。这个家维持到抗日战争开始不久，就分居了。共五家，我同母亲弟弟算一家，分地二十亩，一点房子，无农具，解放后土改时划为中农。

我的父亲病逝时我仅六岁，已完全不记得了，我由祖母和母亲抚养。初在本镇小学读书，十二岁那年，家乡旱灾严重（连续三年），因我无父，祖母主张在她临死（已病，年已七十）前把我安置好，她征得我的二堂兄严佐民的同意，送我去陕北榆林他工作的地方上学，我于是年初就离开了家

这是严佑民入狱后，按照监狱当局的要求，所写的全面而系统地反映自己生平和经历的一篇材料。原题目《自传》，是监狱当局钦定的。收入本集时，编者改动了标题。文中的小标题也是编者加的。

乡。到榆林后，初入第六中学，下半年即转入陕北公立职业学校（四年制）学纺织科。三年后，由于我同当时在榆林的叔祖父严子汉发生矛盾（我在他家吃饭），备受欺压和虐待，于寒假期间（春节前）赶我出门（我仅十四岁），逼得走投无路曾自杀，我堂兄从外地回来后站在叔祖父的一方，毫无同情之心，反而重打我一顿。在此情况下，我于1933年夏天决然只身返回家里，当时是十五岁。回家后，除我的母亲外（祖母已故），其他人都冷眼相看。我随即赴西安投奔舅父党寒波（母亲的胞弟，我在榆林时曾来信答应管我上学）处，他当时是医生，家里无什么人（仅有一小孩），在他的帮助下，于是年秋入陕西华县私立咸林中学高中部一年级（二五级）。我同我的家庭一直没有什么经济关系，除过年放假回家看看外，来回的路费家里都无人负担，我的学费、吃饭等主要靠党寒波，这就是我入学校的情况。

我的政治生活，共分四段：一、入党前后；二、敌后根据地的七年；三、东北工作的七年；四、北京工作的十五年。

## 第一章 入党前后 (1934 ~ 1939. 4)

### 边城烽烟激励赤子报国志

在咸林中学 (1933年下半年 ~ 1936. 6)

咸林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，设有高中，我们是第一班。学校校长是王子休，当时思想倾向于陶行知一派，所谓“晓庄师范”是他追求的理想。但是，他不是当地人，很受当地的绅士阶层的知识分子反对。我初到那里不久，初中部（约六七百人）就搞过游行，反对王子休，一年多以后，王就被搞走了，此人以后变成了反革命。后来的校长叫做范仲之（？）本县人，思想反动，抗战期间做了反革命，解放后被镇压。

高中这一班的学生，除少数几个人是本县的外，大部分是从各地招收来的初中毕业或没有毕业的学生。这些学生中，有一些是西安的中学中被开除的；有些是不能在西安存在的（因为“九·一八”后，西安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，有相当

① “九·一八”，即“九·一八事变”。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根据中日两国间的不平等条约，驻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侵略军（关东军），突然袭取沈阳城，并进而占领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等省。这一事件，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并吞中国、称霸亚洲的重要步骤，从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热潮。



1935 年在陕西华县咸林中学，和严威（右）  
（抗日战争牺牲）

长的时间进行了抗日救亡活动)。因此，我们班虽然只有几十个人(开始有 60~70)，各种思想都有，年岁也有大有小。当时就有党的活动，特别是“九·一八”后西安的学生运动。1934 年的时候，初中部的学生中开始有些政治活动，主要表现是阅读进步书报的增多，1935 年上半年有些人就离开咸中了，到陕北或其他地方参加革命工作了。对我来说，接受了不少的抗日救亡知识，以及政治上的事。当时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长征到陕北时曾路过华县农村，留下不少影响，在学生中间传说很多，红军大学在瓦窑堡的招生广告

我们曾接到过，也看过一本《西征记》油印的小册子，是描写红军长征的一段。总之，这些对我都有深刻的影响，和我一起住的周定甲（当时我不知他是党员）向我说过不少关于党的活动，还有王均（后来我入党的介绍人）也说过不少。这些人同我是同班，有的同县，有的虽不是同县，但放假回家时同路，有时还路过我家时住一两天，我当时年岁最小，王均那时已二十几岁了。我以敬仰的心情，听他们议论，这时我也读了不少进步刊物和书报，还有我的大堂兄<sup>①</sup>自苏联回来宣传过共产党的主张，苏联革命后的情况，以及小学时受到教员们的影响等，更使我懂得了许多事。而当时蒋介石正在调动大军到陕北围攻红军，在西安屠杀共产党员，而日寇在华北不断深入，我就更加赞成他们的主张，促进了我参加革命和抗日救亡的决心。对于我自己的前途问题，感到茫然，虽然我也想过干工业这一行（因我当时比较爱好自然科学），但这种形势下，怎么可能呢？王均、杨春茂、刘玉堂、申力生等人在 1934 年或 1935 年上半年就走了。我记得在王均走前的一个夜里，在操场上，我曾向王均表示过想和他们一起干革命，王均当时答应了我的要求，并说以后来找我。

严信民（1902~1988）

1919 年 5 月参加陈独秀、李汉俊领导的研究社会主义的进步团体“SY”，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24 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，次年回国在河南国民军二军担任联络工作，1927 年任于右任秘书，后与党失去联系。1928 年到德国留学，参加反帝大同盟，1933 年回国。“抗战”爆发后，从事抗日救亡文化活动。1942 年加入中华解放行动委员会（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），编辑《中华论坛》、《人民时代》，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。1946 年夏到陕甘宁边区，1947 年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，前往香港，1949 年到北京，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。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，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常委。

1935年的十月间，一个下午天快黑的时候，初中部晁清芳突然找到他的房子里，当时有和俊川、刘玉堂，我看到刘玉堂来了，知道是从王均那里来的，这样，我们共四人就在房子里开起会来。我记得是刘玉堂先说，王均叫找我们开会，成立一个支部，和俊川做书记，晁清芳为组织（干事），我是宣传干事，还有一本什么文件我记不得了，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正式加入了共产党，没有举行仪式，介绍人就是王均，此后我即同和、晁联系。

## 进行革命活动，被开除学籍

我们开过会后，形势发展很快。东北军的一〇九师在陕北被红军消灭，剩下的残兵败将开到华县，有一部分临时住在学校里，他们讲了许多红军的事（可能有许多是我释放的俘虏），替我党做了不少宣传。同学们抗日的热情高涨，谈论抗日救亡活动的到处都有。北平学生“一二·九运动”<sup>①</sup>开始，上海的《大众生活》刊物大力报导，很快在学生中掀起了热潮。就在那时前后，我们接到一份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的传单，要求各地支持“一二·九运动”，并有政治主张。借此机会，我们就在咸林中学掀起组织学生抗日救国会，把这个意见和传单利用吃饭的机会（在饭堂）宣布，很快就得到支持和响应。此后各班派出代表，组织筹备会，在会上正式

<sup>①</sup> “一二·九运动”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。1935年12月9日，北平学生6千余人上街游行示威，反对日本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。很快得到全国响应，形成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。

研究成立一个威林中学抗日救国（亡）学生联合会，起草成立的宣言，宣布支持北平学生的“一二·九运动”，并决定召集全校学生开会，选举领导机构（执行委员会）。很快就开成立大会进行了选举，以赵玉机等十几个人为委员（我是委员之一），赵为主席，大会决定游行示威，通过了宣言，通过了向北平学生的支持信，进行了游行等活动，并利用农村中过春节前的各种大的集日，停课组织成宣传队进行宣传，一时搞得十分热烈。学校当局感到突然，也不敢阻止。寒假前，我们赶印了许多宣传品，分给学校同学，回到家乡进行宣传。在此期间，我们还联合了其他学校（当时还有少华女中、少华小学）成立了联合会，因为放了寒假没有什么大的活动。

1936年学校开学，形势有了变化。突出的有几件事：一是学校里增加了军训教官（一般都是由国民党派来的）；二是初中三年级来了一位学生（姓潘），很快被学生识破是国民党特务（原来是三原县的一个学生，被捕后叛变当了特务）；三是高中因毕业班准备考试停课（当时也只剩得三十左右人），并放出风来不再办高中了，看来是学校有了准备，加紧控制；四是学生开学（回）来后也比较消沉，特别是本县附近的学生更为消沉。在此情况下，如何再发动起来就有点问题，因此就把这个运动转到深入学习这方面去了。组织读书会，动员订阅进步刊物和书籍，互相借阅和讨论，一时订阅刊物的人很多，仅《大众生活》就有七十多份。对于这位新来的军训教官，我们想打击一下他的威风，学生中已经对他有反映，因为他搞什么“新生活运动”升旗等活动，同

学们都有反感。有一天早上上早操，这位教官把同学们搞得很疲劳，满身出汗突然停下来做慢的动作。我借此机会当场向他提出质问和抗议，说他不顾同学身体，弄得他下不了台，学生们一哄而散。这件事引起了校方当局的恼怒，立即出布告开除我学籍，并要求我马上离校。同学们议论纷纷，有可能再闹起来的趋势，有些进步的教员对学校这种态度也不赞成。在此情况下，学校也不催我离校，也不提什么开除问题，不了了之。

## 叛徒告密，躲避追捕

记得是四五月间，我们支部开会时来了一位叫姚全（此人我以为是交通，以后知道是韩城县委书记）的人，参加了我们的会，这个人头发很长，说是因为没有耳朵。在这次会上，谈了咸中的情况，我记得他没有说多少话，以后就走了。过了些时候，一天夜里，西安有一个叫王勋（王均的弟弟）的学生来通知，姚全被捕，叛变，叫我们即速转移。接此通知后我即同和、晁商量，我们三个人还有赵玉机、周定甲，一起走，赵和周因为是已公开的学生会负责人，其他的姚全不知道。这样决定后，我随即通知他们于天明后离开学校。在我走时，已经发现自火车站来了宪兵数人到校长室，我出了校门，到西关，同赵、周，还有和、晁等人会合在一起，研究办法。晁是中部县人，同和一起到他那里暂时躲起来；我是从渭南上火车（因到华县车站无车，怕被捕捉，即走到渭南上车）回到西安我舅舅家躲起来；周直向平凉（甘肃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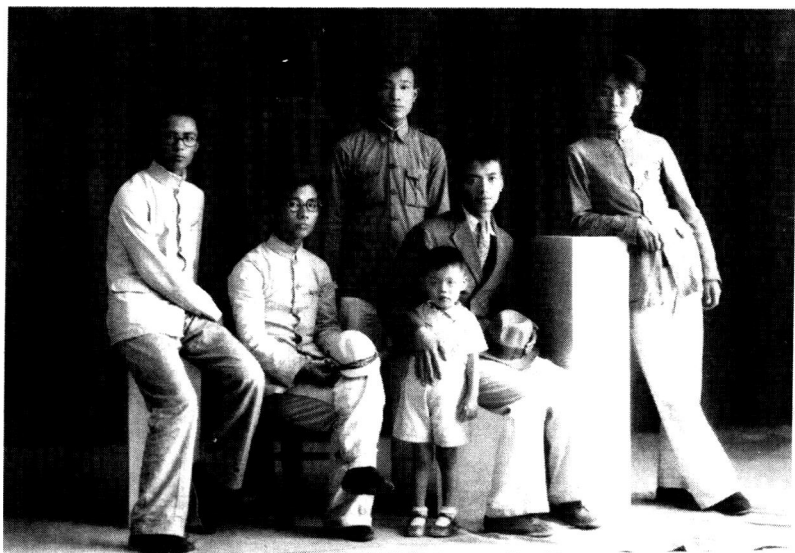
他叔父那里暂住，赵到他家里躲避。总之学校不去了，就这样我们都走了，时间大概是 1936 年 5 月 6 月间的事。我们离开后，听说当时敌人找了赵玉机、和俊川，再未找别人，也未捕人，就走了。过了一些天，宪兵第二次来初中部捕了一些人，这些人当时都不是党员，但很活跃。以后知道就是那个姓潘的特务学生告密而捕去的，捕去的人据说“双十二事变”，即“西安事变”<sup>①</sup>后都放出来，大部分都参加了红军工作。那个潘姓特务学生在“双十二事变”后，被放出来的这些人在农村一个什么地方碰到了，就地召集了大会，在那个混乱的时候，杀掉了。

## 在北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

从西安到北平 (1936. 6 ~ 1936. 12)

我在西安舅父家里住了两个月还多，我告诉舅父我已毕业（当时不敢说学校的事）。他在西安附近一个县里做卫生院长，不常在西安。他说：你要上大学，要到北平去，去了之后也考不上，因为西北学生（文化）程度低。因此，你到北京找一个补习学校，先上一年，明年再考，并希望我学工。在那个情况下我当然愿意去了，他让我做点准备，即可走。

“双十二事变”，即“西安事变”。1936 年间，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十七路军，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，同意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，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。被蒋拒绝，并亲赴西安强令张、杨部队进攻红军。12 月 12 日，张、杨联合行动，逮捕了蒋介石。中国共产党委派周恩来、叶剑英等赴西安，说服张、杨，在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下，将他释放。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、联共抗日的条件，事变和平解决。



1936年在西安，严佑民（右2）和同学及表弟党天中（男孩子）恰在此时，原来在陕北榆林职业学校的一位同学申广盛突然来找我，据他说曾到我家里，见到我母亲，才到西安来找我。当时我对此人有点不太相信，看他样子土里土气，但是住在旅馆里又很阔气，被子等都是绸子面子，有点不对称，看起来又很有钱，我问他找我何事，他说看看我干什么，我就说明我的打算，他也说和我一块去北平，我问他路费有了没有，他说有。这样，我们两人约定一起到北平，我还找了一套高中学生的军服给他，可以买火车票是半价。就这样我们两人一起去北平，一路上我们谈了不少，他告诉我这些年在军队中工作，打过仗等事。到北平后，他因在车上又碰到一位熟人，就和那人一起住到延安会馆（因那一位熟人在那里

住)；我投奔到一位咸中的同学郭兆民居处华州会馆(前门外南柳巷)。

我在南柳巷华州会馆住了一个多月，认得了一些人。在那一带会馆里住的陕西学生不少，但是政治空气不好，革命朝气不多，长期下去有堕落的危险。我没找补习学校，自学了一段数学。那位同来的申广盛，不久又想回去了，我也赞成他回陕西。他的来历我当时确实弄不清，已经有人告诉我，同我一起来的人是红军，据说是申自己说的，我不大相信。我也问过申，申不承认，他只说过红军打仗好等。我劝过申说话注意对象，有些人我们都不认识，不然会出事，申也赞成，我还告诉他我也想搬家，这个地方不好，我不知道该搬哪里。申广盛就这样回去了。在此后不久，我认识的二位叫田文扬和韩志华的，两人搬到东城沙滩住了，他们劝我也搬去。这样，我也就搬到那里去了，住在景山东街，北大二院对门的宝祥公寓里。

沙滩一带的空气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，一个是政治上的抗日救亡活动，一个是学习的空气，比较严肃而紧张。那里的公寓里都住的是不在学校的学生，“民族解放先锋队”<sup>①</sup>在那里很活跃。我住在那里不久，韩、田两人先后找我谈，要我加入“民先”。我因对“民先”还不了解，又没有组织关系，因而考虑了很久。我探问“民先”的纲领和目的，主要是怕上当。他们两人又说不那么清楚，有点对我生气了。我

<sup>①</sup>“民族解放先锋队”，全名叫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”。成立于1936年12月，是“一二·九运动”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组织的青年团体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许多队员参加了“抗战”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。

总对他们笑说，不急。此后在“民先”刊物上，看到“民先”成立的历史和纲领后，看出来完全是我党的主张，又是在“一二·九运动”后南下回来的学生组织起来的，这样，我决然加入了“民先队”。由田、韩介绍，被编入沙滩街头分队，队长姓丁，还有两个女的，一个叫段燕（砚），一个不记得名字，我们有十来个人。参加“民先”后我的活动就多了，记得北大当时有一位叫小吴的领导我们，这时的活动主要是参加由“民先”组织的各种座谈会，听名教授讲话，有时还派我们到农村和门头沟去，读的材料也不少。这个时间我就忙这些了，什么学功课，准备考大学的事也不干了。

“双十二”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，我参加了，是随北大学生一起的，在马路上经受了警察和保安队的冲击和追打，后来各路队伍慢慢都集合起来，都进入景山，大约好几千人。进去后警察即把门封起来了，据说是当局要派人来接见，但就是不见人来，大家有点急，就在那里喊口号、唱歌，想出去门已封了，也没有东西吃。一直到黄昏时，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来了，在大门里台子上讲了话，说了一些好听的，替二十九军做表白，并表示二十九军一定发扬“喜峰口”的精神等，并要同学们看行动和表现，希望同学们回去守秩序，整队回去。我没有想到他会说这么多好听的话，这样我们离开了景山，整队高呼口号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反对内战，一致抗日，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。我们回来后，才知道今天的情况变化，上午和下午不同的原因是，西安发生了事变，扣留了蒋介石，张、杨提出了“八项主张”。对我来说，由小县城的游行到大城市的游行示威又经历了一次锻炼。

## 摒弃求学念头，赴晋绥救亡守土

这次事件不久，“民先队”即号召队员到山西去，说那里形势好，晋绥军在绥东守土抗战，要许多人在那里做救亡工作。我在此情况下就报名自愿前去，从此决心不再读书了。临走的时候，我给舅父党寒波写了一信，一方面感谢他对我的帮助，一方面说明我也不再上学了，当前抗日救国要紧，否则一切都没有，以后也就和他断绝了经济联系。

我们去太原的共约五百余人，分了四个大队，我当时还被指定为一个大队内的分队长。我们乘火车经石家庄去太原，我记得在石家庄换车时，还是由太原来的小火车接去的。到太原后，即有若干大汽车把我们接到一个兵营里。

进了太原民训团（1936. 12月下旬 ~ 1937. 4）

民训团是军阀阎锡山办的，由当时在山西的薄一波同志主持的。该团有政治部，每一队都有政治工作人员，我们这一批来的“民先队员”，全部被编入民训团，我被编入一队，队长是阎锡山的独立旅派的一个上尉连长，班长也是他们的士兵，一队的政治工作人员是刘有光。我们同来的那几个大队长除陈大东很快就离开外，其他几个都在一队，“民先”的组织无形中就分散了。初去的几周，礼拜天我们还有些活动，以后活动的人越来越少，许多人都加入了当地的合法组织

“牺牲救国大同盟”。<sup>①</sup>有人说，在山西，就要按山西的办，这里情况特殊，比方喊口号，只能说守土抗战，不能说收复失地等。以后他们更进一步地说赶快加入“牺盟”，毕业后即分配工作当官，有武装带，挂小刀。“民先”在这里不能活动，只能加入“牺盟”，或“抗先”，<sup>②</sup>都是一样。我们来的人中，有一部分人很有反感。我一直坚持不加入，并在班里小组讨论统一战线问题时，公开提出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，和统一战线是不一致的。当时有赞成的，有不赞成的，大多不表示态度。以后参加“民先”活动的人就更少了，有人又放出风来取消“民先”。我在此一时期，还利用礼拜天到山西大学，看到一位咸中高中毕业的同学沈洪江，经过他又认识了一些同学，在那里也搞“民先”活动，“山大”里也有“民先”组织。在民训团中，我们不愿参加“牺盟”的人越来越少，越加孤立起来了。当时“西安事变”已和平解决，道路也通了，有一位是西安学生代表叫方晨的，他是由西安到北平的，因“双十二事变”回去不了，“民先”把他们（二人）也介绍到民训团，这时他们想走，我们很支持他们走，并希望他们回到西安后，如果那里能活动，我们也去。这个时间，开始零星的已有到西安和延安去的，在学生中也传出风来，到陕北去。有一位红军代表周小舟到了太原，并

“牺牲救国大同盟”，即“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”，又称“牺盟会”，是193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，在山西省建立的一个地方性群众抗日团体。阎锡山在“牺盟会”建立初期表示支持。后来蒋介石、阎锡山消极抗战、积极反共，许多“牺盟会”干部和进步分子遭到杀害。原“牺盟会”中坚持抗日的成员，继续进行抗日战争。

“抗先”，即“青年抗日先锋队”的简称，是抗日战争时期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群众组织。

在民训团和军政训练班讲过话，轰动一时，议论纷纷，想走的人相当多。

## 穿上红军的军装

我在此情况下决心走了。有人支持我们走，我们先走，后边他就来。我从“山大”学生中一位叫刘银海的借来十五元做路费，和彭泊还有一位红军东征时被俘的指导员（他们有一批人也在军政训练班学习），三人一起离开了太原，直奔西安。到西安后，曾找过方晨，据说红军就在三原县，三原县城有办事处，可以直接去。我们三人就直接到了三原兵站里，站长叫董振国，对我们很热情，我们对他说明了来意，并说了我自己的情况，董即答应送我们到延安，他们把我们介绍给耀县办事处。我们到耀县后，办事处长叫彭加伦，他把那位红军同志留下送到延安去了，要我们回三原到总政治部分配工作。这样，我同彭泊又回来，由兵站送我们到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云阳镇的总政治部分配工作。我们两人分配在宣传部工作，任干事。从此我就算是红军的一员，穿上了红军的军装。这是一九三七年四月间的事。

### 参加红军总政宣传部的工作（1937. 4 ~ 1937. 9）

宣传部当时部长是陆定一，全部只有五六个人，另外有一个宣传队约三四十人。当时工作不太多，我除做一般的工作外，编了一个红军战士算术课本。当时共同工作的有一位张益泉同志，曾问过我的党组织问题，看样子想发展我为党

员。我即告诉他我是党员。他问，那你的关系呢？我就告诉他我的情况和经过。他告诉我要我找证明人，和原来的关系人等。有一天，我偶然在云阳街上碰到王均，我真喜出望外，当即告诉王均我在这里工作，这里的组织要介绍信和证明。王均当即答应给我写了一个证明信，并告诉我他在省委机关住（我才知道省委在云阳）。我把这个证明信交给了直属队指导员。在红军整编的前夕，宣传部长陆定一告诉我调我到后政工作（延安）。我即同总政的其他干部一起，编成一个小分队，向陕北延安行军。走的时候，我问过指导员我的组织问题，他说你去吧，我给你转去。

在延安，后政——抗大——陕公（1937. 12）

我到延安后方政治部，住在招待所，当时未分配工作。大家学习的空气很浓，我因无事，向后政领导要求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被批准后我即到了抗大被编入九队，队长是黄克公。在九队时间不长，陕北公学成立，九队全部撤归陕公，编为一队。一队的主任是周纯全，队长方明，我被选为区队长，在这里学习了约两个月就毕业了。毕业后即分配到青委去工作。

在“陕公”一开始登记时我就提出来我的组织问题，把情况也说明了。他们说转来的材料始终未见，也可能转丢了，也可能就没有转。组织上说要我找证明，我在延安街上碰到杨安仁，我问他什么地方，他说在党校学习，我请他证明，他当即写了证明我在华县的一段情况，因他是那次被捕了的，他知道情况多。我把这个证明交给组织。其实，那个时候杨

春茂也在一队，他也知道情况，他到延安是带着组织关系去的，可能是一队的支部负责人之一，当时支部书记是齐语。在快要毕业的前几天，总支找我谈话，通知我，重新入党，介绍人为方明。我问他以前的还算不算，他说算，待以后全部证明找着再说。我也填了表等手续。他没有通知我候补期的问题，但是我到西安后还是举行了转正仪式。

## 公开身份是“八路军办事处服务员”

在西安青年救国会工作（1938. 1 ~ 1938. 11）

我被分配到“青委”后，冯文彬即带我们一批新来的干部到三原、云阳，办青年训练班。我任二大队副大队长。这一期结束后，即搬到安吴堡办，人称安吴堡青训班。主要是训练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学生，当时冯文彬是主任，实际上是胡乔木主持工作。我到安吴堡后即被调到西安青年救国会组织部工作。“西青救”，主任是冯文彬，宣传部长胡乔木，组织部长是黄华。我在组织部，第一次被分派参加西安学生中的“民先”分子组织的冬令营，在三原附近的一个古庙里，我去做了两个星期的教员。第二次分配我到抗战剧团，这个剧团是延安有名的孩子剧团，准备到关中各县活动（三原、蒲城、合阳、韩城），要我去剧团临时任交际部长，对外做联络工作。而黄华部长交待我到合阳后，留在那里帮助他们办青训班，并说那里准备搞武装，要我到合阳就脱离剧团留在那里工作，到县政府找一位科长（我记得姓樊），并写了介绍信。我随剧团一路从三原到蒲城搞演出活动，到了合阳后，